读史札记

卢文弨《群书校正》的真伪及其价值

韩　超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群书校正》,《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卢文弨撰”，其体例类似《群书拾补》，为校记汇编之作。然而，与《群书拾补》被广泛称引不同，此书鲜有学者提及或利用。[①] 因此，有学者提出此书非卢文弨所撰。若此论成立，以此书为依据的研究成果都将存疑。作为清中期重要的校勘学家，卢氏校勘成果向为学者所重，故辨明此书真伪，对于认识此书价值及推动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一、《群书校正》的内容

卢文弨《群书校正》(以下简称《校正》)一书，旧时书目均未著录，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两部。其一“孔继涵校，一册，十一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②]（以下简称“孔校本”）此本首叶钤“伛偻传家”朱方,《禹贡指南》一叶下钤“艳朝”朱方、“凌云”白方。此本末附绿格稿纸二叶、红格稿纸一叶、无格稿纸一叶。红格者版心下镌“云自在龛”。绿格者乃反面书写，正面版心镌“清史长编”。据张云研究，此四叶稿纸所书内容为缪荃孙撰《书录解题考证》，绿格者为誊清抄件，红格及无格者为缪氏亲笔。[③] 又一部，“金绍纶校，一册，十一行二十字，无格。”[④]（以下简称“金校本”）此本书衣右侧书“卢抱经先生著”，左侧书“聚珍版新翻本校正”，其下小字书“嘉庆庚申六月壬子朔九日大兴金绍纶松溪题”，嘉庆庚申即嘉庆五年(1800)。正文首叶钤“言上林印”白方、“金松溪”白方、“金茗之印”白方、“大兴金氏绳斋藏书之印”朱长方。金绍纶，清乾嘉间大兴人，金溶之孙。[⑤] 卢文弨于乾隆五年（1740）至十二

[收稿日期]　2020-12-25
[作者简介]　韩超（1988—　），男，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南京 210018；hanchao38684186@qq.com

① 笔者仅见张云曾用其中《直斋书录解题校正》进行相关研究。参见张云:《〈直斋书录解题〉校例三种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②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452 页。

③ 张云:《〈直斋书录解题〉校例三种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 年第 5 期。按：此文中说“亲笔两叶，红格”，检原本胶片，只一叶有格，另一叶为无格稿纸。

④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 1452 页。

⑤ 梁战、郭群一编《历代藏书家辞典》著录“金茗，字绍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47 页)。郑伟章《北京文献家新考》云“金绍纶字茗之”(《藏书家》第20辑，第29页)。《善本书室藏书志》卷5著录明刻本《广雅》一部，云:“有‘大兴金氏绳斋藏书之印’‘绳斋’‘金绍纶印’‘金茗之印’诸图记。”上述二书即据丁丙著录之印文，或将“金茗”作为金绍纶之名，或以之为字，均误。“金茗之印”当作“金茗之印”,《广雅》今藏南京图书馆，笔者目验之。至于“金茗之印”与金绍纶是否有联系，资料不足，暂阙如。

年间，曾馆于金溶家，《抱经堂文集》卷二八《浙江督粮道一斋金公家传》曰“余主公家最久”，并云金溶有孙五人，绍纶即其一。[①] 两部书除了编排顺序不一致外，正文内容相同。“群书校正”应非两书原有书名，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在书目编纂过程中所定书名。因为无论是孔校本还是金校本，其书卷端并无统一题名，版心、内封等一般古籍题写书名处亦未有。且旧时书目未曾著录此书，则不可能因袭原有著录。金校本于书衣题写之名乃是据正文首叶第一行所题，然以全书体例来看，此非卷端题名，而是版本分类（详下文）。若以此为全书之名，书中“武英殿本翻刻校正”“知不足斋丛书校正”则无统摄。因此，编目者亦未将金校本书衣题写书名作为此书书名，而今定之名是较为符合本书性质内容的。同样，这两部书书内文字也无明确显示孰为著者的信息，《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卢文弨撰”，或是依据金校本书衣所题“卢抱经先生著”而定。因孔校本与金校本内容基本相同，故将孔校本亦著录为“卢文弨撰”。

《校正》是一部校记汇编之作，共收所校书 45 种，每种书又据其版本归于一大类，共有“聚珍版新翻本校正”“武英殿本翻刻校正”“知不足斋丛书本校正”三大类。每大类下先写所校书书名，然后按原书卷次一一出文，下以小字双行书作者校勘意见。但各大类在正文中是重复交错出现的，因此整部书实际被分割成了 11 部分。今据孔校本顺序详列所校书籍：1.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春秋繁露》；2. 武英殿本翻刻校正：《帝范》；3. 知不足斋丛书校正：《农书》《蚕书》《楼公耕织图诗》《渑水燕谈录》《中吴纪闻》《离骚草木疏》；4.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农桑辑要》《考古质疑》《仇远金渊集》；5.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蛮书》《曲洧旧闻》《云谷杂纪》；6. 知不足斋丛书校正：《五曹算经》《金石史》《闲者轩帖考》《补汉兵志》《澹生堂藏书约》；7.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易象易言》《仪礼识误》《邺中记》《老子道德经王弼注》《浩然斋雅谈》《岁寒堂诗话》《岭表录异》《涧泉日记》《茶山集》；8.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禹贡指南》《春秋传说例》《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傅子》《拙轩集》《瓮牖闲评》《汉官旧仪》；9.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春秋辨疑》《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孙子算经》《五经算术》《麟台故事》《敬斋古今黈》；10. 聚珍版新翻本校正：《直斋书录解题》；11. 知不足斋丛书校正：《四朝闻见录》《洛阳搢绅旧闻记》。

金校本大类顺序与孔校本有异，大类下所收书及其顺序则基本一致，仅一处差异。孔校本《农桑辑要》《考古质疑》《仇远金渊集》归一组，《蛮书》《曲洧旧闻》《云谷杂纪》为另一组；金校本《蛮书》《曲洧旧闻》《云谷杂纪》《考古质疑》《仇远金渊集》为一组，《农桑辑要》单为一组。不过，孔校本与金校本的这一处归并差异可能是由于装帧问题导致的。《校正》在书写形式上有这样一个特点，只要归于一类的书均是接续着写的，而大类与大类之间则另起一叶书写。但金校本中，同一大类下的《考古质疑》却未接《云谷杂纪》，而是另起一叶，后接《仇远金渊集》。而位于别一大类首部的《农桑辑要》正好写满六叶，所以不管是另为一类，还是同为一类，接续《农桑辑要》都需换叶书写。由于全书没有页码，若把《考古质疑》《仇远金渊集》误装至《农桑辑要》前，就正好呈现如今的面貌。如果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孔校本与金校本各大类的收书与顺序就完全一致。并且，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两部内容相同的书，它们的顺序却有如此差异。因为原书无卷次与叶码，散叶在装订时以类归之，而类与类间的顺序就无一定了。

二、《群书校正》的真伪

《校正》的真伪问题首先是陈东辉提出的，在其主编的《卢文弨全集》中，陈氏认为此书

---

① 卢文弨《浙江督粮道一斋金公家传》载，孙五人：绍章、绍簪、绍纶、绍祺、绍闻。可见其名皆以“绍”字为行辈，则所谓“金茗”定非绍纶之名。

“不能认定为卢文弨本人之著作”，故将之摒于全集之外。但陈氏判断此书为伪的依据是“遍查与卢文弨相关的各种资料，均未发现有任何地方提到卢文弨曾经有这样一部《群书校正》之作”。[①] 虽然梁启超以“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为伪或可疑”为辨伪书一法，但清代文献未被著录及未被知晓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仅从有无文献记载来判断《校正》非卢文弨之著作尚嫌证据不足。此前，张云曾直接引用《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立论，并认为缪荃孙《书录解题考证》多源于卢文弨《群书校正》，认为此书为卢文弨撰无疑。[②]

不过正如陈氏所言，与卢文弨有关的资料从未提到卢氏有这样一部著作，所以从一般的传世文献中很难寻检出《校正》是否为卢氏所撰。然而有一部确为卢氏所撰的校记汇编之作——《群书拾补》，它的编纂方式对我们判断《校正》真伪有一定启发。《群书拾补》中的校记是卢氏摘编校本中的校记而成的。那么，如果《校正》是卢文弨所撰，其中的校记也可能是卢校本校记的摘录。所以，首先确定卢文弨是否用相应的版本校过这些书，再调查这些卢校本是否存世，最后将存世卢校本的校记与《校正》比勘，庶几可对《校正》是否为卢文弨撰作一判断。下面我们将遵循这一步骤进行详细考察。

陈修亮《卢文弨钞校题跋本目录》曾从公私目录及相关文献记载中对卢校本进行过统计[③]，笔者将《校正》所收之书与陈氏统计的卢校本比对，得《校正》中卢氏确曾校勘者有以下几种，按版本将之分为五类：

1. 武英殿本翻刻本：《仪礼识误》《春秋繁露》《蛮书》《直斋书录解题》《傅子》《涧泉日记》《老子道德经》《仇远金渊集》《茶山集》《拙轩集》《浩然斋雅谈》。

2. 知不足斋丛书本：《五曹算经》《庚子销夏记附闲者轩帖考》。

3. 武英殿活字印本：《邺中记》《云谷杂纪》《涧泉日记》。

4. 其他版本：《仪礼识误》《春秋繁露》《中吴纪闻》《直斋书录解题》。

5. 版本不明：《易象意言》《春秋辨疑》《邺中记》《金石史》《农桑辑要》。

上述五类合计 25 部，5 部有不同版本。所以，从文献记载及馆藏调查来看，《校正》中有 20 种书卢文弨确曾校勘过，其中第一、二类中的 13 部与《校正》所收书版本相当。[④] 其余 25 种卢氏是否校勘过不能遽断，但尚不能排除校勘过的可能，因为即如《群书拾补》中诸书亦有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然确为卢氏校勘。在这 25 部书中，有 12 部仍有卢校本存世，且其中的 10 部与《校正》所收书版本相当，今备列如下：1.《仪礼识误》三卷，清乾隆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南京图书馆藏。2.《蛮书》十卷，清乾隆江苏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南京图书馆藏。3.《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清乾隆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南京图书馆藏。4.《傅子》一卷，清乾隆四十二年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上海图书馆藏。5.《涧泉日记》三卷，清乾隆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南京图书馆藏。6.《老子道德经》二卷，清乾隆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安吉县博物馆藏。7.《茶山集》八卷（存卷一至四），清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杭州市图书馆藏。8.《拙轩集》六卷，清乾隆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浙江图书馆藏。9.《金渊集》六卷，清乾隆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南京图书馆藏。10.《浩然斋雅谈》三卷，清乾隆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南京图书馆藏。笔者以南京图书馆藏卢校本与《校正》内相应条目进行比勘[⑤]，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况：

---

① 陈东辉：《卢文弨全集前言》，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 1 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2 页。

② 张云《〈直斋书录解题〉校例三种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③ 参见陈修亮：《卢文弨钞校题跋本目录》，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 15 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

④《校正》所谓“聚珍版翻刻本”或“武英殿本翻刻”未知是浙江翻刻本还是江苏翻刻本，所以只能说相当。

⑤ 孔校本与金校本文字基本相同，若无异文则不特别说明所录文字出自某一本，若其本有误，则径录正确者，不再说明。

（一）《校正》基本同卢校本

1. 捂授（《仪礼识误》卷一）

《校正》："案今《释文》'捂'作'梧'，从木。《既夕礼》亦同，他篇亦多作'梧'字，从木，是也。张氏每不知择善而从。"

卢校本："《释文》从木，是。凡枝梧亦从木，《既夕》同。'授'字此当作'受'。"（"捂授"二字左上角标"乚"符号，改"捂"为"梧"。）[1]

2. 谛（《仪礼识误》卷二）

《校正》："案今《释文》作'啼'。"

卢校本："今《释文》作'啼'。"

3. 矣符管（《蛮书》卷一）

《校正》："案此是馆驿之'馆'，作'管'讹，下同。"

卢校本："召音弟云，此当是馆驿之馆，与下一例。"（改"管"为"馆"。）

4. 宁寔馆（《蛮书》卷一）

《校正》："案下文云'安宁馆本是汉宁郡城也'，别此，'宁寔'当是'安宁'。"

卢校本："'宁寔'疑'安宁'，否则下有缺文。"

（二）《校正》详而卢校本略

1. 成岁之漂黔不克免（《仪礼识误》序）

《校正》："案'成'乃'戌'字之误，此书刻于乾道八年，推而上之乾道二年为丙戌岁，温州海溢漂民庐，见《宋史·五行志》。淳，永嘉人，谢黔当亦其乡人也。"

卢校本："乾道二年丙戌，温州海溢，见《宋·五行志》。"（改"成"为"戌"。）

2. 吐蕃遂封异牟江寻西卑贱（《蛮书》卷十）

《校正》："案《新唐书》吐蕃封异牟寻日东王，此脱'日东王'三字，并改事中国所由遣使册封一节亦脱去。此下俱纪其迎使者之仪文也。'江西卑贱'四字乃写者妄羼入。"

卢校本："'江西卑贱'四字不当有，当作'日东王'。"（乙"江寻"二字。）

3. 至元中尝为溧阳教授旋罢归（《金渊集》提要）

《校正》："案集中有《乙巳岁三月为溧阳校官上府》诗，则是元成宗大德九年，非至元中也。又《寄史贵质》诗题下注云'丁未同庚'，诗云：'淳佑六十翁，生遇时节好。'则再遇丁未为大德之十一年也。又《久客思归》诗云：'自我来溧阳，四见木叶秋。'又云：'役满须过更，代者乃未至。'则仁父自以官满辞职，非旋罢归也。此所云似皆欠细考。"

卢校本："在任四年。"（"至元中"改"大德九年"，"旋罢"改"代满归"。）

（三）《校正》略而卢校本详

矣伽异犬卿（《蛮书》卷三）

《校正》："案此即上文阁罗凤长男凤伽异也，'矣'字误。"

卢校本："石泉弟云，此疑'凤伽异'，乃阁罗凤之子名，应承'凤'，下文'凤伽异先死'可证。"

（四）《校正》说明校改缘由卢校本只有校勘结果

1. 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礼记（《仪礼识误》序）

《校正》："案'记'字衍。观下云'河间献王之得先秦古书者曰礼记'，又云'礼者今之仪礼，记者今仪礼之记'，分疏甚明，便知此句不应有'记'字。"

卢校本：（朱笔于"记"字上画一方围，表示删去此字。）

---

[1] 引号内为卢校本校语原文，括号内为笔者对卢校本校勘面貌的叙述性文字。

2. 染注曰朱则四入欤（《仪礼识误》卷一）

《校正》："案《释文》前于'六入与'音'余'，此亦必作'与'字，作'欤'者讹。"

卢校本：（朱笔圈去"欤"字"欠"旁，表删，则此字作"与"。）

3. 唐武宗实录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校正》："案《通考》载晁、陈两家并作一卷，是也。陈氏明云《邯郸书目》唯有一卷，盖两家俱但据其所有而著之录，非只依旧史空张[①]卷数为也。知此则可以不必与诸书区区数[②]异同矣。"

卢校本：（改"三十"为"一"。）

4. 独南丰之说最为简明（《浩然斋雅谈》卷上）

《校正》："案下所载《弥陀阁记》及《答黄汉杰书》皆李觏泰伯之文也，见《盱江集》，而《元丰类稿》则无之。岂公谨误记，抑转写致讹耶？"

卢校本：（"南丰"二字划线，旁书"泰伯"二字。）

5. 丽人歌陶秀实邮亭之典（《浩然斋雅谈》卷上）

《校正》："案'典'当作'曲'。陶穀使江南，李氏时作词赠驿卒之女，即'如因缘，[③]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者是也。驿卒女乃李氏使伎饰为之。"

卢校本：（"典"画圈，旁书"曲"。）

（五）《校正》有而卢校本无

1. 太和城（《蛮书》卷一）

《校正》："案《新唐书》皆作'大和'，此书第七卷以下亦多作'大和城'，凡作'太'者今皆改正。"

2. 黄潜马臻皆一时名士（《金渊集》提要）

《校正》："案潜当是溍字之误，集中第三卷有《和黄晋卿溍金陵见寄》诗。"

3. 朝辞二竺寺暮宿三茅峰（《金渊集》卷一）

《校正》："案三竺之名旧矣，三竺与三茅相映有致，此作二竺，疑误。"

4. 富文忠之使辽云云（《浩然斋雅谈》卷上）

《校正》："案所跋似非富公神道碑。"

（六）《校正》无而卢校本有

1. 望偏卒罗矣罗君立（《蛮书》卷三）

卢校本：（"卒"字下增一"子"字。）

2. 案解题自周而下所列止十八国（《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卢校本："连周十九国，脱'许'，当补入即全矣。"（"八"字上画两点。）

3. 月收七百余斤（《涧泉日记》卷上）

卢校本："必有讹。"（"百"字上画两点。）

以上仅举数例，经全书比勘，卢校本的校改或校记在《校正》中绝大部分有相应条目，其中《仪礼识误》的校改或校记在《校正》中均有相应条目。并且，《校正》和卢校本校记间虽有详略、表述的不同，但论证方式、过程及校勘结论是一致的。至于《校正》有条目而卢校本无相应校改或校记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今存底本不误。如《蛮书》卷一"太和城"条，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本《蛮书》作"太和城"，江苏翻刻本已改作"大和城"，故卢氏用翻刻本作为底本校勘，自然不用出校。南京

---

① "张"字孔校本作"雍"，今据金校本。

② "数"，孔校本作"较"。

③ 金校本、孔校本均抄作"如因缘"，孔校本校改"如"为"好"，作"好"是。此仍据原抄本抄录。

图书馆藏江苏翻刻武英殿本《蛮书》卷十后卢氏校勘题识云："乾隆戊戌八月八日，东里卢弓父校讫。旧校出误字此已刊正，今又对出数处。"可知，卢氏在不同版本的《蛮书》上各校了一次，后一次校又校出多处，这些问题在前一版本中也有，只是第一次未校出。汇入《校正》时，作者按前校版本出文，又将后校版本中的校勘成果也汇入。因此，《校正》中前校本底本有误者，在后校版本中就无法体现。

二是校记有交叉。卢氏会于同书不同版本上校勘，有时还将前一次的校勘成果誊录在后一次校本上。那么，当两种版本极为接近，卢氏在不同时间又有不同的校记，而这些校记又未集中誊录于某一本上时，两者就形成了相互交叉的校记。汇入《校正》时，不同本中的校记汇于一处，如果只阅某一本，就会有《校正》有而卢校本无的情况。这一点在今存两部卢校《涧泉日记》中比较明显，如提要"滤许昌人"条，《校正》："案桐木韩氏本贯颍川，南渡之后仲止之父无咎寓居信之上饶，仲止亦复居焉。《瀛奎律髓》所载尚可考。"卢校武英殿本"滤"旁书"滮"，"滮"右上角标"乚"。[①] 校曰："《宋诗纪事》作'滮'，《瀛奎律髓》作'琥'，疑皆误也。'滤'见《说文》，云'水流皃'，故字以仲止也。韩氏本居颍川，南渡后犹题其旧贯耳。仲止父已居上饶，《宋诗纪事》称仲止后仍居信上，则不当云许昌人。此不妨。"卢校浙江翻刻本无。又卷中"要是为助为多"条，《校正》："案两'为'字必有一误，或是'其助为多'，或是'为助居多'，若并用则句子颇不谐美。"卢校武英殿本无。卢校浙翻殿本上"为"字右上角标"乚"，表示此字有误。单一一部《涧泉日记》无法与《校正》中条目全部对应，但两者相加后则能与《校正》中所有条目对应。浙江翻刻本卷上末卢氏题识曰："旧于别一本子上校过，将属友誊于此本上。"从此本看，应尚未全部誊录其上。

古人云"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这不仅说明校书之难，也说明校勘者在不同时间由于主客观因素一般会有新的校勘发现。同一校勘者尚且如此，对于不同的校勘者来说，在校勘方式多为他校和理校情况下，一部书内的校勘意见完全一致几乎不可能。假设《校正》另有作者，也只能是利用卢校本校勘成果，再为之一一考证（因为卢校本只有结果而无论证过程，《校正》却有大量的校改理由），否则仍难以解释这种重合。但这首先需要将《校正》内所有书的卢校本都汇聚起来，从今存卢校本的收藏源流及相关记载来看，似乎很难有人汇聚如此多的卢校本，这种情况从理论上来说是较难实现的。

此外再说三点旁证：一是劳权曾引"卢抱经摘录手校本"，其文与《校正》一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劳权过录卢校本《中吴纪闻》，其跋云："壬寅冬见中吴顾氏思适斋传校义门学士校本，令小史移誊一副。今复见抱经学士摘录手校本，即据何本重勘，不尽依据叶钞，乃录之卷眉。回首初校时已五年矣，抚卷慨然。道光丙午十二月四日蟫盦记。"[②] 劳氏既云"摘录手校本"，则当是一种校记汇编之本，而非手校本。此本卷一《春申君》下劳氏过录曰："《越绝书》作考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此吴伐楚当作幽王立。"下又接"日为燕会时以诗篇为乐，校本日与时互易，殊过泥。"然"日为燕会时以诗篇为乐"乃下一条《蒋密学》中句，若劳氏过录自卢校本当校于原文处，不应有出文。检《校正》上述二条正相接，其余所录亦可与《校正》"中吴纪闻"条相应。故劳氏当录自《校正》（劳氏所见未必有此书名）。二是卢文弨除《群书拾补》外是可能撰有类似著作的。《文集》卷7《重校经史题辞》曰："余故复取诸本与新本，校其异同。其讹谬显然，则仿《六经正误》之例为一书。其参错难明，则仿《韩文考异》之例为一书。"[③] 此文撰于乾隆十五年，较撰《群书拾补》早三十七年，表明卢氏在平日的校勘中会将校勘成果另撰一书。三是金校本将《校正》题为卢文弨撰。金校本的题名者金绍纶是金溶之孙，卢文弨与

① 此当经过两次校勘，先改"滤"为"滮"，后认为"滮"误，再标出作校记。

② 劳权跋毛氏汲古阁刻《中吴纪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8089。

③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7，中华书局，1990年，第84页。

金溶、金潢兄弟私交甚好，曾馆于金溶家。《抱经堂文集》卷17又有《与金崞县天来（潢）书》，并云“吾于天来交最深”。[①] 绍纶题写此书时卢氏过世仅五年，或其闻于前辈亦不可知。

综上所述，在《校正》与卢校本校勘成果高度重合，其论证方式、结论较为一致，且没有明确证据指明《校正》另有作者的情况下，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校正》的作者就是卢文弨。至于二者间的差异，主要是作者在去取之间的选择，这一点只要稍比勘今存卢校本《韩非子》与《群书拾补·韩非子校正》即可知。显然，我们不能以二者间差异，否定《群书拾补·韩非子校正》非卢文弨撰，则于《校正》亦然。

三、《群书校正》的价值

（一）为研究卢文弨校勘提供新的史料

卢文弨一生以校书为己任，其校勘成果刊刻行世者主要是校记汇编而成的《群书拾补》，札记体学术著作《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以及抱经堂校刻之《春秋繁露》《逸周书》《颜氏家训》等书。此外，卢氏还有大量的手校本及他人过录卢校本传世，不可谓不丰。然卢氏仍有大量的校勘成果亡佚，主要是其校本，正如卢氏在《群书拾补小引》中所说，“余手校之书，将来必有散于人间者”。目前统计卢校本最全的当属陈修亮《卢文弨钞校题跋本目录》，陈氏根据公私藏目及相关文献记载共得卢文弨钞、校、题跋本358种（不论存亡），然如《校正》中的《禹贡指南》《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春秋传说例》《补汉兵志》《岭表录异》《澹生堂藏书约》《帝范》《农书》《蚕书》《楼公耕织图诗》《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海岛算经》《考古质疑》《瓮牖闲评》《曲洧旧闻》《渑水燕谈录》《金石史》《四朝闻见录》《洛阳搢绅旧闻记》《离骚草木疏》《岁寒堂诗话》等23种书，陈氏均未著录。这表明这些书的卢校本可能已经亡佚，并且鲜有文献记载卢文弨曾校过这些书。《校正》的发现及作者的确定，在原有的基础上丰富了卢文弨的校勘成果，为我们研究卢文弨的校勘提供了更多的数据。

（二）为相关古籍的整理提供新的参考材料

《校正》所收书中占最大比例的是“武英殿聚珍版书”的翻刻本，这些书流传较少，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典籍。正因流传少，所以很少有善本可以对校，甚至有些书本身就是从他书中辑佚出来的，因此脱讹衍倒在所难免。《校正》显示的这部分校勘成果在相关书籍的整理研究中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目前尚未得到学者的关注。

如《直斋书录解题》一书残佚已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才又有全本行世，经卢文弨校勘后则更为精审。1984年，徐小蛮、顾美华以“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为底本，元抄残本及卢文弨校本为主要校本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上古本”），这是目前最好也最为通行的点校本。然据张云研究，《校正》中有一百六十多条校记上古本未有，[②] 其中当有不少涉及文字是非。如卷六“金国官制条”，上古本据上海图书馆藏卢校本补入。[③]《校正》于“齐斋台谏论”条下曰：“案此条后尚有‘金国官制一卷’，见《通考》。”南京图书馆藏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直斋书录解题》此条为另纸粘于书中，亦作“金国官制一卷”，可见上古本在补入时脱“一卷”二字。又卷八“唐十四道蕃志十卷”条，陈氏解题曰：“唐太府少卿梁载言撰。其书广记备言颇可观。载言不见于史，又有《具员故事》，题‘凤阁舍人’，及《梁四公记》，亦云载言所录。”点校本于“不见于史”下出校，曰：“卢校注：‘不见

---

①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17，第245页。

② 张云：《〈直斋书录解题〉校例三种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5期，第91页。

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于史’下,《通考》作‘未定为何朝人’。此书有大和以后沿革，当是唐末人。与此不同。”①《校正》曰：“颇可观，案《通考》作‘颇有可采’。又‘载言不见于史’下,《通考》作‘未定为何朝人’。此书有大和以后沿革，当是唐末人。与此不同。”点校本只涉及《校正》的后半部分，未对“颇可观”出校。下半句既使用卢校，上半句不应删去，当是上海图书馆藏卢校本未校出“颇可观”。南京图书馆藏浙江翻刻本于“颇”下增“有”，删去“观”字，书一“采”字。可见此条当是卢氏后来校浙江翻刻本时校出的，与上述《蛮书》的情况相似。若将来再修订此书，《校正》应当成为重要的参校材料。

（三）为研究《知不足斋丛书》编纂提供新的史料

《校正》中比较特殊的是校勘“知不足斋丛书”，笔者将之与《知不足斋丛书》刻本相校，发现《校正》所用之底本与刻本有差异。如《金石史》序“郭允伯先生著也”条,《校正》曰：“案不若改作‘嗣伯’，如宋人称书嗣征之例。”刻本作“郭嗣伯先生著也”。卷上“无一不穷极奥渺”条,《校正》曰：“案‘渺’当作‘眇’，深也，又与‘妙’音义同。”刻本作“无一不穷极奥眇”。卷下“笔端流润而微伤挑”条,《校正》曰：“案‘挑’似当作‘佻’。”刻本作“笔端流润而微伤佻”。又《闲者轩帖考》“燕都自五代终宋未肄中国”条,《校正》曰：“案‘肄’疑是‘归’字。”刻本作“燕都自五代终宋未归中国”。《补汉兵志》“以劝边兵而归”条,《校正》曰：“案‘劝’当作‘勒’。”刻本作“以勒边兵而归”。可见,《校正》中多数校改后的文字与今传《知不足斋丛书》刻本文字是一致的。

何以《校正》出文与今传《知不足斋丛书》本不同，而校改后的文字与之一致？《知不足斋丛书》虽有先印、后印之别，但据马培洁《〈知不足斋丛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研究》可知，《校正》所收书中仅《五曹算经》《离骚草木疏》有重校后印本，且均有题识，一见便知。②若《知不足斋丛书》本不误,《校正》不可能出校，且其出文亦无着落。可能的原因就是,《校正》中的“知不足斋丛书”非今传刻本，而是鲍廷博据以刊刻之底本，刻本可能吸收了部分校勘意见，径改了底本文字。如《渑水燕谈录》卷十“少年挟弹何狂游”,《校正》曰：“案‘游’疑是‘纵’字。”《知不足斋丛书》本此作“少年挟弹何狂逸”，无校记。《知不足斋丛书》本之底本乃赵琦美脉望馆旧藏，鲍氏跋曰：“此帙出自明正德间白沙贡氏，吴郡赵氏清常又以宋刻补足末卷。”今南京图书馆藏一种清抄本（索书号 110725），亦是从赵氏藏本而出，正作“少年挟弹何狂游”。如果据鲍氏刻本、今存鲍氏刻本之底本，得以确证《校正》所谓“知不足斋丛书本”即鲍氏刻本之底本，那《校正》无疑对于研究《知不足斋丛书》之编纂是全新的史料，其他亡佚《知不足斋丛书》之底本亦可借《校正》一窥其貌。同时，鲍刻《知不足斋丛书》本虽附有校记或校勘按语者不少，但径改底本文字而不出校记者亦有之。如《归潜志》“刊刻底本中许多鲍氏出疑误校之处，鲍刻本中是以鲍廷博认为正确的字刊刻的”，③并未出校。因此,《校正》可补充《知不足斋丛书》内相应诸书未出校的不足，同时可窥见诸书底本面貌。

四、结语

《校正》是一部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校勘著作，它的作者学界认识多有不足，我们通过与卢文弨传世手校本的比勘，确认《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是可信的。《校正》收书 45 种，较《群书拾补》收书 39 种为多，部分书的校勘精审程度虽无法与《群书拾补》相比，然其对于卢文弨校勘学研究、相关古籍整理研究等均有重要价值。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 239 页。

② 马培洁:《〈知不足斋丛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 年第 3 期。

③ 马培洁:《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94 页。